**目 录**

**[高校反腐倡廉研究]**

**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历程与实践逻辑…………………………………………………李斌雄 唐 羽(1)**

**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实现不想腐的基本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学术论坛综述……………………………………………………李斌雄 杨竹芸[(13)**

**[古代监察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巩建萍[ 钱耕耘 (23)**

**[学思践悟]**

**讲政治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首要要求……张云玲(32)**

**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历程与实践逻辑**

李斌雄 唐 羽

改革开放40年高等教育领域的反腐倡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在全社会领域展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在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积极应对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面临的各种风险和考验，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整治“四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表明，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2035》要求: “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的反腐倡廉实践历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总体研究思路，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防止割断历史和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和把握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和把握4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与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之间的关系；把案例分析与因果关系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对改革开40年来高校违纪违法案例的历史演变和因果关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本文在系统考察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实践逻辑和实践特点，总结其历史经验并进行科学的理论反思，对于新时代高等学校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学界开展高校优化教育政治生态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在社会的全部领域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改革开放起步和展开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1978—1992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1992—2002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2002—2012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反腐倡廉建设(2012—2018年) 。高等教育系统是区别于全社会教育系统中的比较高的层次，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建设进程既受到教育改革发展进程的影响，受到教育制度体制机制的变化发展的影响，又受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历程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的深刻影响。从影响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实践的主要因素分析，教育系统自身因素和市场经济因素以及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决策部署是影响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实践的主要因素。因此，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每个历史阶段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形势既与全党全国反腐倡廉的形势有一致的方面，也有高校自身的特殊形势，因此，高校反腐倡廉的举措在遵循全党反腐倡廉方针政策措施的统一部署前提下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高校反腐倡廉的绩效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教育制度恢复和教育体制改革展开阶段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实践(1978—1992年)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逐步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调整，高考制度、学位制度、自学考试制度和留学制度等教育制度也得到恢复或建立。随着改革开放由起步到全面展开，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行为标志，教育体制改革也正式全面启动和展开。高校反腐倡廉所面临的形势既同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所面临的形势具有一致性，也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1.1978—1992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形势分析

在这个阶段，教育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1992 年后民办教育兴起，中国教育走向多元发展。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绘就教育改革发展的蓝图，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的目标。《纲要》规定，在办学体制改革方面，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以中央、省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重点是改革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学校后勤工作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社会化。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这个阶段教育立法加速发展，先后颁布国家的《教师法》(1993年)、《教育法》(1995年)、《职业教育法》(1996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 。这些法律的实施标志着高校走向全面依法治教。1999年1月颁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教育总体规划。按照《纲要》和《行动计划》指明的方向，1995年启动实施“211工程”和1999年启动实施“985工程”，建设高水平大学。1999年6月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任务。

这个阶段高校改革发展的形势直接影响了高校反腐倡廉的形势。从全党全社会的反腐倡廉形势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腐败现象大面积滋生蔓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复杂。与全社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腐败现象大面积滋生蔓延，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复杂相比较，高校腐败现象也逐步滋生蔓延。主要是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特别是一些有审批、审核、许可等权力的部门越来越成为社会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公关”的目标，容易发生违纪违法问题。高校扩招和招生“并轨”改革过程中拜金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和各种人情关系问题，例如在录取期间一些招生工作人员参与有关招生工作的各种私下活动(包括递条子、打招呼等) 。行业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民办高校有关教育收费、招生录取、学籍和文凭管理等方面的违纪违规问题。经济市场化和高校后勤改革社会化过程中高校基建、财务管理、图书设备采购和招投标领域的经济腐败问题开始滋生蔓延。

2.1992—2002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党的十四大后，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制定了跨世纪反腐倡廉战略，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既保持惩治腐败的力度，又制定一系列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律法规制度(制定了2000 余件党规、文件)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个时期的反腐倡廉重大措施有: 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和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和派驻机构陆续恢复建立；确立“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格局；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推进“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干部人事”等体制机制改革；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高校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逐步健全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并在高等学校确立了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纠正教育系统行业不正之风、查处大案要案三项工作格局。

这个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1998—2002年五年来，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共立案437件，其中学校基建、大宗物资采购中发生的经济类案件比较突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亿多元。高校中经济类案件占60—70%。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主要涉及招生、基建、校办企业等领域。例如，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高某某5人于1992—1995年间在招生录取工作中的贪污、受贿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4月17日判决。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某某于1990—2000年间分管学院招生工作，收受考生家长的贿赂和礼金共计25.5万元。湖北省委宣传部原部长缪某某于1998年在省社科院违纪获取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案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原处长高某某于1995—1999年间在担任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例如，原武汉大学1981年12月至1995年1月，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一千余件；查处(含复查) 违纪党员59人。1995年1月至2000年8月，原武汉大学纪委、监察处接受群众来信来访600余件次，初步核实案件线索80余件，立案18件，给予13人党纪处分，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

3．1992—2002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特点

这个阶段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高校反腐败措施基本上采用全社会的反腐败措施，教育行业性特点不够明显。高校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逐步在高校建立健全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和三项工作格局，工作的重点放在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纠正教育系统的行业不正之风。其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社会化，高校经济腐败现象的发生逐步与社会经济腐败现象的发生趋同。高校所查处的案件，主要是教育权力(招生权) 的腐败案件，官学交易腐败初步显现，后勤和校办产业领域的经济腐败现象同社会腐败现象雷同。其三，高校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一些高校没有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致使有些反腐败任务没有得到落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还比较严重。高校党内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还比较薄弱，有的领导干部存在好人主义等庸俗作风，执纪执法偏宽偏软，存在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问题。高校纪检监察机关自身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工作中创新精神不够，高校一些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实践(2002—2012年)

党的十六大以后，腐败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依然艰巨。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逐步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16字方针，并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七大后，按照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要求，反腐败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治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持续加大。高校自1999年开始扩招，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形势的突出特征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这一方面满足了更多人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规模扩张进程加快，资金投入加大，廉洁风险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与高校的腐败现象相互交织，高校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特征。高校反腐倡廉在遵循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的同时，也逐步注重廉洁教育和校园廉洁文化建设以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健全，显现出高校自身的特色。

1．2002—2012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形势分析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2005年10月28日国务院作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自1999 年国务院作出扩大高等院校招生的决定后，高等教育在新世纪快速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2005年高校在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2006 年全国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学生和成人本专科学生规模达到237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2%；民办高校( 含独立学院) 总数达到596 所，在校生为280多万人。200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23%，计划2009年达到24.2%，2015年达到36%，2020年达40%，在学总规模约3千万人以上。201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落实人才强国战略。2010 年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提出到2020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从这个阶段全党反腐倡廉形势来分析，2002年至2007年纪律检查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党员违纪案件有所减少，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同时，“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念动摇，思想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一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落实得不够好。反腐倡廉工作存在薄弱环节，有效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多。纪律检查机关对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不够，工作机制和工作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这个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 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这就是“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的总体态势判断。

在这个阶段，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高校所面临的反腐倡廉形势也可以用“一个基本矛盾”和“三个并存，两个依然”的总体态势判断。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群众对于良好教育的强烈需求和良好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教育改革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还会伴生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实践仍然是成效与问题并存，防治力度不断加大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提高与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高校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三次提到教育战线的问题。胡锦涛指出: 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易发多发的状况仍未改变，出现一些案件多发的新领域，“高校、医院等单位案件呈多发态势”，提出:“这些年，中央采取一系列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的政策，加大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扶贫开发的投入，但这些领域发生的一些腐败问题使这些政策的效用受到了影响”，要求“继续治理教育乱收费”。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加强高等院校反腐倡廉建设，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要求“继续治理教育乱收费”。

2．2002—2012 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根本标准，全面履行纪检监察职责，深入推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和坚强保障。

其一，在高校反腐倡廉的目标定位上，坚持围绕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局，努力做好两个服务，即在高校更加自觉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全局中来谋划和部署，融入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坚持惩治腐败和保护干净干部并重，优化高等教育发展环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保驾护航，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服务，为高层次人才的健康成长服务。其二，在高校师生员工中广泛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自律工作。这个时期高校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贯彻实施《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组织编写大学生廉洁教育读本，努力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校园环境。配合有关部门对部直属高校在职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行为开展专项清理，制定高校领导干部离职和退休后从业行为规范。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大力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其三，坚持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切实加强教育行风建设，维护教育公平。一方面，高校严格规范收费管理，稳定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决策机制和公示制度，坚决禁止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另一方面，在高校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2004年查处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购中出现职务犯罪的窝案、串案，涉及10多所学校，涉案人员达40多人、总计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同时，积极推动与检察机关的合作，努力搭建沟通协作平台，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督促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提倡学术诚信。其四，扎实推进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完善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高校贯彻执行教育部制定的“2008—2012 年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五年工作规划”，制定实施各高校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设具体方案。各高校逐步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决策失误，其中，各高校进一步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并向院系单位延伸。教育部对各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监督试行条例和“三重一大”等制度执行情况等开展专项检查，切实提高制度的权威性。其五，坚持改革创新，切实加强监督工作，不断完善高校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高校是人才培养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更加严格地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高校加强对党的各项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坚决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尤其是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的教育和监督，坚决落实“六个决不允许”。高校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干部任用、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产业等人财物管理使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其六，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纪检监察队伍。党的十六大以后，高校纪检监察干部结构不断优化，素质不断提高。2007年与 2003 年相比，31个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专职纪检监察干部由668人增加到753人，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研究生以上学历由13%提高到23.4%，45岁以下干部由26% 提高到41.6%。各校认真落实《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暂行规定》，高校纪委书记由党委副书记担任的比例已达 92%，为充分发挥纪委组织协调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个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取得了明显成效。2003年至 2007年底，全国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共受理信访举报36.9万件(次) ，立案 3.7万件，结案3.4万件，处理违纪人员30892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32人，县处级领导干部826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01人，挽回经济损失5.78亿元。2003年至2007年共5年，查处的典型大案要案有: 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某某、原校长刘某某分别受贿60余万元和170余万元，一审分别被判处10年和13年有期徒刑；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某某受贿160多万元，终审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某某贪污受贿1000多万元，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天津大学损失巨额资金，学校原校长单某被追究失职责任。

在中央纪委领导下，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 2011年加强信访办案工作，加强与直属高校所在的 18 个省( 市)纪委协调沟通，会同中央纪委三室、案管室召开直属高校案件工作协调会议，探索建立健全案件线索沟通、案件查办协同、案件处理协调、办案工作交流、办案成果共享、办案舆情应对等6个协作机制。加强信访举报督办力度，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共受理信访举报4944件，实施分级管理，督办3568件，收到回复2350件，占督办件的66%；重点核查370件，完成300件，占重点核查件的81%。对实名举报及时办理并回复举报人，做到件件有着落。2011年全国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共收到信访件 33165件，立案3349件，结案 3133件，移送司法机关273件，290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净化了教育系统干部队伍(见表 1) 。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经过高校持续努力，高校反腐倡廉建设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逐步深化，行业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3．2002—2012 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特点

这个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按照中共中央 2005 年颁行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联系高校实际强化系统设计，具有明显的高等教育战线特色。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强化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注重预防高校腐败问题；但个别教师学风不正，弄虚作假、诚信缺失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 一些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其二，高校内部治理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同步推进；但是一些高校办学行为不规范，乱办班、乱收费，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不规范依然存在。其三，惩治腐败力度同全党全社会一致，注重查处典型性案件。高校腐败案件的违法金额开始超过1 千万(例如，李海婴案) 。但是，个别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意识还不强，不能真正将反腐倡廉建设纳入整体工作布局中。其四，治理教育行业性不正之风力度加大，效果明显，但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是在经济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进行的，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各种腐朽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一时难以消除，党风廉政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四)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实践(2012—2018年)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组成部分，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也纳入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发生历史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形成了新的历史特点。

1．2012—2018 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形势分析

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2491所。其中，“211工程”高校112所、“985工程”高校39所；中央所属高校113所，地方所属高校2378 所。全国高校教职工党员数119.76万人，占教职工总数的52.84%，党支部89133 个。在校大学生党员数316.26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2.08%，党支部 82716 个，已形成“低年级有党员、高年级有支部”的格局。每年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占全国新党员的三分之一，2010 年达到40. 2% 。在教育部直属系统中，教育部机关司局26个、直属单位32个、直属高校75所、驻外教育处(组) 65 个，直属机关有372个党支部。教育部直属系统共有公务员562人、驻外干部204人，加上直属单位和直属高校干部职工人数，约30.1万人。其中，中管干部66人、司局级干部1078 人、处级干部21177人。根据中央关于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的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教育部党组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即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办学活力为主线，以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为重点，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教育体制机制，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全党反腐倡廉的形势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巡视利剑作用彰显，不敢腐的目标基本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到 2018 年下半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全党面临着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任务。全社会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表明，全党反腐倡廉工作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表明党内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消除存量、遏制增量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用概括的语言说，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复杂”“四个不纯”“四个交织”“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见图 1)

所谓“两个复杂”就是指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所谓“四个不纯”是指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所谓“四个交织”是指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四大考验”是指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种危险”是指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这些问题和风险考验也是高校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高校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必须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这种客观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

同时，这个阶段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有的学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没有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教育改革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有的学校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监督作用发挥得不好； 一些部门和岗位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监管力度不够，反腐败合力不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与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期待还有较大的差距，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2012年以来，高等教育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多发，还出现了窝案串案，犯罪手段日趋隐蔽，既有贪污挪用、权钱交易等社会领域普遍存在、共有的腐败现象，也有高等教育领域里的一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近年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聚集部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学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增多，教育领域“七大关口”中，每年均有一批案件发生，乱收费、套取资金私设“小金库”等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在科研经费方面，2012年以来，直属高校已有 118 名科研人员被调查( 例如，原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被一审判定贪污科研经费共945万余元，获刑10年)；2013年，重点抽查了30个高校的346个项目，30% 的项目存在问题。在招生考试方面，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案件。内外勾结、多人共同作案。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某某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在基建工程方面，发生的案件占教育系统案件总数的 24%。2013年，四川高校多名校级干部因基建等问题“落马”，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在校办企业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监管体制不顺畅、监管工作不到位、抗风险能力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明显增多。如上海交大立昂股份有限公司前任高管兰先德、叶文良、范小兵贪污、挪用和受贿金额 1.53亿元，分别获刑 20年、12 年和6年。二是涉案主体呈现多元化。在高校受党政纪处分的人员中，中层干部和教师占 52%。三是窝案、串案增多，有的案件涉及几十人。四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金额从百万元到千万元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上亿元，大多发生在招生、基建工程、科研经费和校办企业等领域。

2．2012—2018 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学校各级党组织、纪检工作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坚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践行党章党规党纪，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强化“四个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之以恒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执行到位； 强化党内监督，推进重点问题治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力度加大；深化政治巡视，坚持立德树人，着力规范教育管理行为，维护教育公平和群众利益，着力保障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着力净化教书育人环境，教育生态特别是教育政治生态治理。在这个阶段，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在党的十八大后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端，逐步严格执行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规范执行高校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到党的十九大后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高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二是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口，以高校党的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高校落地生根。三是高校党组织切实增强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按照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法贯通的要求，切实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高校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四是按照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政策和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要求，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使高校反腐败斗争逐步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向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整体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前进。五是党中央和教育部党组建立对高校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并推动直属高校党委对二级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工作，让巡视利剑作用不断彰显。六是狠抓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重点整治群众身边腐败“蝇贪”，坚决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微腐败”问题。七是由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到严格贯彻落实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在这个阶段，高校在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实践中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效果显著，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保证(见表2) 。

新时代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在取得历史性成绩的同时，高校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然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根据中央第八巡视组于 2015年10月31日至12月31日对教育部党组开展的专项巡视所反馈的问题清单来看，有的高校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执行干部交流、退休等制度不严格，有的高校违规配备干部和管理人员；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四风”问题时有发生；高校设置审批、自主招生、MBA 教育等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插手学校工程建设、侵占科研经费、生活腐化等问题依然存在。2018年3月1日，教育部党组把往年的“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改为“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从“党风廉政建设”到“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变化彰显了新时代教育部党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3．2012—2018 年高校反腐倡廉的主要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反腐倡廉发生历史性变化和取得历史性成就，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查处违纪行为力度明显加大，反腐震慑力度强化。2016年与2011年比较，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系统立案增长4.3倍，纪律处分人数增长 5.66倍，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增长2.38 倍(见表3) 。

其二，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纪律建设特别是政治纪律得到强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明显强化了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教育，以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为主，把纪律挺在前面，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印发规范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强化政治责任，制定和实施了一批条规，例如制定和实施《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深入解决“四风”突出问题的有关规定》和《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规定。其三，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力度加大，查处力度空前。其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同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和治理现代化进程密切结合。其五，问责和巡视倒逼高校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得到贯彻落实。其六，高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到加强，教育政治生态逐步改善，但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和大学生廉洁教育力度减弱。

**二、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实践逻辑和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逻辑，既与全党全社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密切相关，又表现出高等教育子系统固有的实践特征。

(一) 改革开放40年高校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和腐

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演化特征一般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而逐步向城市全面展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和政府管理经济权力的逐步下放以及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展开，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发生的腐败大案要案比较多，而在农村基层、城市社区发生的“微腐败”现象比较突出。比较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和腐败现象的演化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高校政治问题的发生呈现螺旋式的周期性。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违规违纪现象出现一个周期性变化，即改革开放展开阶段违反政治纪律问题比较突出——建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违反廉洁纪律问题比较突出——新媒体信息环境中违反政治纪律问题和违反意识形态纪律问题显现。

第二，高校经济问题的发生由滞后性演化为同步性。

2000年跨世纪之前，高校经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滞后于社会经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说，改革开放起步和展开阶段，高校作为“象牙塔”之学术圣地很少发生经济腐败案件。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后勤改革社会化过程中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事权运行逐步被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侵蚀。新世纪之交及其后，高校经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同社会领域的经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趋向同步。此后，高等教育领域绝非一片净土，教育部门也非清水衙门，贪污挪用科研经费案件明显增加，基建工程领域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权钱交易违规招生影响恶劣。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由“滞后发生”演化为“同步发生”。

第三，高校“四风”问题的发生往往受到社会“四风”问题的侵蚀。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往往受到党政机关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和市场经济领域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的深刻影响。高等教育领域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问题以及学术生态污染问题，既与高等教育自身制度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完善、高校管党治党宽松软密切相关，又深刻地受到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机构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影响。

(二) 高等教育领域反腐倡廉实践与党内、国家机构、社会领域的反腐倡廉

实践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按照系统辩证法的原理，高等教育系统是与社会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受社会大系统的制约。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部署，使得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呈现出与党内、国家机构和社会领域反腐倡廉实践的共性特征。同时，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历程又有自身的特殊轨迹和特殊规律。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逻辑又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实践特征。

第一，高校反腐倡廉专门专责机构变化特征表现为“先后恢复重建——分立设置——合署办公——职能转化”的过程。高校反腐倡廉机构的变化既同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机构的变化保持一致，又逐步同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相协调。在高等教育法规制度恢复、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中，经历了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部分院校试行校长负责制，例如，1985 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权威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高等教育法治过程中，1998年8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经过高等教育制度体制机制改革发展，高校党组织的政治权力、校长及其领导的行政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的学术权力、教职工的民主权力构成高校内部权力结构中的四类权力。在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中，高校内部的监督权虽然由多个权力主体行使，但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及其权力运行具有专门性和专责性，对于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具有直接作用。我国大多数高校直到1994年才实现高校内部纪检监察机构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在长时期内高校内部纪检监察机构力量比较薄弱。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纪检监察机构职能转化才逐步聚焦于监督执纪问责。高校纪检监察机构职能的实际发挥状态滞后于中央和地方纪检监察机构职能的实际发挥状态，这与高校党组织属于党的基层组织的特性相关。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公布实施后，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又面临新的转折。

第二，高校反腐倡廉顶层设计和主题变化特征。高校反腐倡廉顶层设计表现为“单一性聚焦→体系性展开→整体性和重点性推进”的特征。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反腐倡廉的历程可以发现，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在20世纪由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和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高校反腐倡廉“三项工作”格局，直到2005 年后高校开始逐步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迈进，并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相协调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反腐倡廉实践既呈现出全面从严治党整体推进，又体现出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口的重点突破特征。由此，高校反腐倡廉顶层设计的主题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高校强化党风建设和严肃党纪；到20世纪90年代，高校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再到21世纪00年代，高校强化反腐倡廉建设；直到新时代，形成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主题。2018年3月1日，教育部党组把往年的“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视频会”改为“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视频会”，高校反腐倡廉实践的主题扩展了外延。

第三，高校反腐倡廉实践目的和手段变化特征。20世纪80—90年代的高校反腐倡廉实践的目的定位在保障高等教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008年高校反腐倡廉的目标定位是“两个服务”，即，坚持围绕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大局，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保驾护航，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服务，为高校人才队伍的健康成长服务。进入新时代，高校反腐倡廉的目标定位是必须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不断净化教书育人环境，形成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内容特点呈现出: 20世纪80年代强化政治纪律，1992—2012年高校强化廉洁纪律，新时代高校强化“六类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反腐倡廉手段变化特点呈现出: 1980—1992年注重划清阶级界限；1992—2012年注重帮助党员干部教师划清法律底线；2012年以来注重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法衔接和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第四，高校反腐倡廉动力和效果变化特征。改革开放40 年来高校反腐倡廉持续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同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动力又有所变化。在改革开放起步和展开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是基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内部动力；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高校之间的竞争压力又成为各高校反腐倡廉的动力；进入新时代，高校反腐倡廉的动力在于党中央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互转换。改革开放40年来高校反腐倡廉实践的效果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改革开放起步和展开阶段，高校反腐倡廉效果明显，高校广大干部教师潜心教学科研事业和管理工作，很少发生经济类腐败现象；在改革开放深化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效果平稳进展，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高校反腐倡廉实践效果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反腐倡廉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

**三、改革开放40年高等学校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和理论思考**

考察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历程，探究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逻辑和特征，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并作出一些理论反思，试图揭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理论结论。

(一) 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实践历程表明，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坚持如下六条基本经验。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校反腐倡廉的绝对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全面落实高校反腐倡廉的责任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第二，必须坚持纪律建设的严格性。为切实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情况发生，必须加强高校党的纪律建设特别是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用党的纪律建设引领校纪校规建设，联系高校实际切实贯彻执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第三，必须坚持依规依法的规范性。汲取“文化大革命”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经验教训，必须坚持在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轨道上开展高校反腐倡廉工作，以执行力保证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不搞群众运动，但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第四，必须坚持权力制约的有效性。为了加快形成高校内部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师生员工民主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加强高校党内监督和落实依法治教有机结合起来，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特别是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不能腐”问题和形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

第五，必须坚持廉洁教育的广泛性。汲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亚文化”侵蚀和渗透高校校园的教训，必须把强化廉洁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结合起来，典型示范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为实现“不想腐”提供基本路径。

第六，必须坚持专门机关的权威性。汲取改革开放起步和展开阶段高校纪检监察队伍力量薄弱、能力不够的教训，必须加强高校纪检监察机关建设，规范纪检监察职权和职责、地位和作用，实现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素质的政治化和专业化，打造纪检监察工作“铁军”。

(二) 改革开放40年高校反腐倡廉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反腐倡廉实践与党内、国家机构、社会领域的反腐倡廉实践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其共性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也就是说宏观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对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腐败和反腐败实践都会产生影响，其中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高校的腐败和反腐败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其特殊性取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特殊矛盾。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治理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推动高校特别是中管高校规模扩张，高校内部治理日益复杂化(包括社会化、市场化)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治理存在诸多短板或漏洞。由此引发市场经济领域的物质利益交换原则对高校治理、高质量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侵蚀。在这个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高等学校治理存在诸多短板或漏洞。

从2017年6月公布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巡视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反馈的情况看，高校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有: 财务和资产管理，校办企业管理，附属医院管理，合作办学管理，后勤基建维修管理，招标采购和教材采购管理，工程建设和项目管理，科研经费和专项经费管理，招生录取管理，重要岗位和重点领域等廉洁风险存在、较高或者突出；其中与经济市场联系密切的校办企业廉洁风险突出，腐败易发多发。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其中尤其是高校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地方更严重，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落实不到位，个别高校内部纪检监察机构形同虚设。因此，解决这些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主要依赖于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高校内部治理体系。

对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转化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的分析表明，在新时代高校廉洁风险防控的总逻辑是: 一方面，必须根据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刻影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部署，进一步强化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现代大学制度，强化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按照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协调运行的机制，强化校内外监督权对“四类权力”运行的制约。

首先，在高校政治权力运行过程中，必须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发挥高校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作用。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强化高校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实，在高校采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有机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的措施，着力加强高校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建设。其次，健全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高校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再次，高校学术权力的运行应当回归知识创造、传播和转化的本色，为培养大批高层次的创造性专门人才服务。最后，尊重教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做实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作用。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应当协助高校党委统筹协调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学术监督、民主监督的合力作用，加快推进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早日实现高校廉洁目标。

**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实现不想腐的基本路径**

**\_\_\_“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学术论坛综述**

**李斌雄 杨竹芸**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落实习近平关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探究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相关问题，2018年10月20日，由湖北省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会主办，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和武汉体育学院纪委办公室共同承办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学术论坛在武汉体育学院隆重举行。来自湖北省纪委监委、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党政部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委党校、武汉市委党校等事业单位，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三峡大学、湖北师范大学、江汉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州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南通大学等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90余名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湖北卫视、湖北日报、检察日报等新闻媒体，《廉政文化研究》《廉政瞭望》《决策与信息》等期刊以及江西高校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分为主题发言和论文探讨两个阶段，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问题研究**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部署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的统领，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总布局的重要方面。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摆在首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多位专家学者深入地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建设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历史回顾、经验总结与学理研究。

1. 探讨党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政治文化、政治生态净化问题

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立于首要地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红平具体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生成理据、发展图景与实现方略。他认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从理论上来看是完善强党理论的需要，从历史来看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现实来看彰显了长期执政过程中党对于自身存在腐化变质可能性的忧思。其发展图景，就是要永葆党的政治先进性，坚持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以及严明政治纪律。实现这一发展图景，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立并举，坚持消除重大政治隐患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相结合。二是刚柔相济，坚持政治纪律规矩约束与党内政治文化熏陶相结合。三是进退有序，坚持突出政治标准选人与淘汰政治“两面人”相结合。四是上下协同，坚持抓“关键少数”示范与开展全党政治教育相结合。五是内外互动，坚持党员党性锤炼与涵养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相结合。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途经。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小秋指出，党内政治文化的五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张小秋具体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要素层次结构和载体结构，探究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和教化、约束和激励、滋养和涵育、批判和净化功能。

在党内政治文化中“圈子文化”由来已久，“圈子文化”的概念首次出现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凸显了整治干部队伍中“圈子文化”的重要性。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唐兴军认为，传统宗族观念与现实利益交织、官员权力过于集中、资源依赖与人身依附是“圈子文化”的主要成因。整治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圈子文化”：一是要构建科学的干部选任标准，优化干部选任制度体系，二是做实民主推荐，强化干部选任的过程监督，三是培育清廉政治文化，防止“圈子文化”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渗入与销蚀。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聂继红探讨了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路径，他指出，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面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路径需要从加强思想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示范作用、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制度这五大方面加以实施。

2.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处分制度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湖北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李瑞运用准确的数据和典型案例，对改革开放40年湖北省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进行了考察，总结了湖北省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他认为，湖北省党的纪律建设经过了重回正规、探索发展、逐步深化和全面加强四个阶段。他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湖北省党的纪律建设在深入推进、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需要进一步认真总结、吸收、发扬光大，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新时代，要坚持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魏新欣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制度角度出发，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处分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路和主要内容。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制度在总体上可划分为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纪律处分制度和党内纪律处分专门法规制度两个方面。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汲取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新实践和制度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纪律处分制度及其建设的与时俱进。

1. 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反腐廉政建设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廉政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廉政建设体系。多位专家学者针对反腐廉政建设历史研究这一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必须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静芸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并具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所面临的自身建设困难、外部环境挑战以及应对举措。她作出总结：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们党便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强廉政建设，并在领导人民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历史中得到有益启示，这为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积累了弥足宝贵的经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智慧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

武汉市委党校讲师罗静对改革开放40年党的廉政建设经验进行了详细梳理并指出，在改革开放新的革命征程中，廉政建设的侧重点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在：1978年至1982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着力于恢复领导干部廉政作风，1983年至2002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致力于完善民主法治建设，2003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向前推进时期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2013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新时期立破结合的反腐败斗争。党的廉政建设历史体现出完整性、阶段性、对象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形象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软实力、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克娥立足于塑造中国共产党廉洁形象的视角，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探讨她认为，执政党的廉洁形象有助于树立廉政公信力，反之，执政党的腐败形象会败坏廉政公信力从历史经验来看，廉洁形象是一个执政党提升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保障从执政党建设经验来看，执政党形象建设是一个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从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来看，惩治贪腐是执政党廉洁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从现实需要来看，廉洁品质与廉洁执政党形象内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木要求。

 还有专家学者针对具体领域中的廉政建设进行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但在新时代背景卜仍然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武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副教授柳鸣毅从体育事业治理的视角，透析新时代我国体育廉政的公共政策，对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俭”、竞技体育选拨之“严”、竞赛工作流程之“细”、体育干部执政之“实”，四个方面进行了政策层面的分析，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廉洁从业。

实行党务公开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江苏省淮安市国上资源局淮阴分局工程师包卫兵指出，党务公开是执政为民的试金石，要自觉忠诚于党，提升党务公开的执行力，忠实履行《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赋予的政治责任。

**二、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研究**

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的治木之策，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静主要探讨了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制约因素及其破解路径。她认为，目前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存在诸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制约因素，例如开展时间短、支撑力度有限、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工作不到位、方法不对头以及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等。破解这些制约因素，一是要真正树立廉洁理念，消除贪腐文化的消极影响，二是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特性和建设规律，三是要增强文化自信，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紧密结合，做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渗透与结合.四是借鉴国外廉政文化建设的优秀经验。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廉政文化建设在高校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论题之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校园廉洁文化建设问题与高校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问题展开了讨论。

武汉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傅纳红对于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提出了“见贤思齐还是止于刑斧?”的疑问，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深入思考。是采用见贤思齐式的道德说教，还是手持刑斧，通过宣示法律制裁的威力，强化人们对规则的遵从度?对于这一问题，傅纳红的回答是:校园廉洁问题可以从道德、纪律、法制三个视角来解读。要先对廉洁问题的性质进行剖析，观察其是属于抵触道德还是不遵守纪律、违反法律。面对不同性质的廉洁问题，应采取不同的应对举措。不同的治理手段功效不一，道德提升、纪律威慑、法律制裁三者之间并不矛盾，反而应该彼此结合、相互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是现阶段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新时代高校如何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项重要任务，引发了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华中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林更茂、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廖明、湖北工程学院生科院党总支副书记陈玲与湖北孝昌县纪委监委张振星均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林更茂重点强调，我们一是要优化高校监察机构，创新完善高校监督体系，二是要加强高校监察制度建设，明确监察对象，聚焦主体职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三是要优化高校监察运行机制，理顺监管关系，发挥监督合力，以良法促善治。

**三、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

少年廉洁，则国廉洁。大学生廉洁教育作为建设大学生思想道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推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亦是此次研讨会的核心论题之一。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许桂芳对改革开放40年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为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历史经验的启示。她发现，重视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我们党历来的优良传统，这不仅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还体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并呈现出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等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经历了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发展、1993年至2002年的加强改进、2003年至2012年的全面发展、2013年至2018年的创新发展四个重要发展阶段，每个历史阶段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情况既有各自独特之处，又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随着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而不断推进。

与会专家学者亦采用了实证调研的研究方法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现状和对策进行了探讨、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碧强围绕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廉洁教育这一主题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清晰地展示了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廉洁观现状:即毕业生较为重视廉洁修养并提出对廉洁文化知识的需求，对腐败和腐败治理的认知也趋于理性，自我维权意识凸显，但对廉政议题的关注度偏低，对反腐政策法规了解不够.廉洁意愿不够坚定等等、在此基础上，刘碧强继续论述了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廉洁教育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五大问题，如对毕业生廉洁教育认知不到位，廉洁教育理论研究薄弱，廉洁教育师资赓乏，毕业生廉洁教育主体责任不明，廉洁教育内容、形式与方法单一，大学生廉洁社团发展缓慢等。他还提出了新时期深入推进高校毕业生廉洁教育的六点建议。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的人”，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实践遵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柯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对大学生廉洁教育的理论省思与实践转向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大学生廉洁教育应在理论上进行三个方面的自觉省思:从人的木质特性出发改进着力方法、从人的现实需要出发改良内容供给、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改善作用机理。他同时指出，还应在实践中把握好三个转向:从正向学习、反面警示单点推进到正、反面教育“协同育人”、从重显性教育、轻隐性灌输到显性、隐性教育“有机结合”、从社会需要主导到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和谐共现”。

武汉体育学院研究生院纪检委员朱雄探讨了习近平家风思想对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的启示、习近平家风思想所蕴含的深厚的“家国情怀”是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的永恒主题习近平家风思想中“以德为先”的理念昭示，德育是大学生廉洁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习近平家风思想所倡导的“身正为范”教育方式，要求进一步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习近平家风思想所强调的“从严教育”理念是抓好大学生廉洁教育质量工程的关键。

武汉大学纪委办公室副主任杨晓岚对于新时代如何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一是突出三个重点，即强化廉洁教育的政治性、突出纪律的保障性、打好拒腐防变的“预防针’，二是把握好三个原则，即贴近时代原则、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原则、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原则。三是拓展三个载体，即发挥社会实践的主环节作用，拓宽校园文化建设平台，拓展网络信息平台。

大学生廉洁教育与思想政治建设密不可分、湖北省委党校张彬基于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实现廉洁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环节全融入，把廉洁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纳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二是实现廉洁教育的思想政治内容全完善，确立科学的理论指导，强化正确的廉洁意识教育，建立现代的权责思想体系、三是实现廉洁宣传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全发展，依托党团组织灵活运用高校组织载体，跟进时代发展步伐，多方位开拓大学宣传载体。

 构建大学生廉洁教育长效机制，同样是加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必然要求、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龚萱指出，大学生廉洁教育长效机制构建应从健全和完善领导体制、巩固和强化主渠道、有效开展社会实践、培育和优化校园环境、加强督办和检查这五大层面着手，从而构建长期有效的组织保障、课程保障、实践保障、环境保障和监督保障机制。

**四、结语**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这一会议主题，立足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维度，从党建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出发，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廉政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廉洁教育研究三个分论题进行了探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深化拓展相关理论研究与提供智库成果很有必要教育的根木任务是立德树人，这就要把“以文化人”作为基木途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能够切断腐败亚文化的代际循环圈、在青少年中特别是大学生中加强廉洁教育，在学校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就是切断“腐败循环圈”的战略举措。

此次学术研讨会在理论上拓宽了视野，全面梳理并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高校廉洁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廉洁教育提供了诸多建设性观点意见，产出了众多学术佳作与智库成果。会议表现出水平高、参与范围广、历史感厚重、研究视野开阔、决策齐询性和实践性比较强的特点，是一次跨学科的、充实的、有深度的会议，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搭建了一个专业性的交流平台，也是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奉献思想成果的一场盛宴。

（本文摘自于《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3期，作者李斌雄系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省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评析及其现代镜鉴**

巩建萍[ 钱耕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随着《监察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新的监察制度已初步建立，但仍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立足于当今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不能罔顾我国的本土资源或者历史传统，需要针对这一制度进行认真的探索性分析，揭示出监察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规律，寻求有益的经验教训，创造性的应用于当今我国监察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中去。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与同期西欧各国及其他文明古国截然不同的监察制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特有的国情，在澄清吏治、巩固封建统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监察制度自战国时期萌芽，确立于秦代，成熟于隋唐，宋元日渐强化严密，至明清形成法律、制度均高度完备的体系。具体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的发展演变：

（一）初步确立阶段：古代的监察制度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在古代官制中有“小宰”和“大宰”两职。[2]其作用是监督文武百官，也就是说在西周时代就出现了此类官职，这也是今天监察官的前身。秦朝时设“御史”一职，行监督百官之权。中央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以监察行政官员与司法官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御史从执掌文书法令转变为专司纠察职责的最高监察官吏，同时制定了《置吏律》、《除吏律》等法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以此为发端；两汉时期沿袭秦制，并略有发展，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每个区设刺史代表中央监察地方。东汉初步发展出御史台模式，之后御史一职逐渐丰富完善。

（二）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割据，虽为封建乱世，门阀氏族操纵朝政，但各王朝统治者反而较重视监察制度，并在这一时期得以巩固和发展。监察组织完全独立，机构初具规模，是这个时期监察制度的最重要的建树，自魏晋以来监察法规方面突显察举和惩罚并重的特点，御史台成为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独立的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但由于过宽的政策，导致门阀世族阻碍和破坏了监察工作，加之朝代频繁更替，地方监察制度逐渐丧失了相对固定和周密性。御史台组织上完全独立，脱离了少府的管理，职权扩大。御史的权力扩大到无须真凭实据的“风闻言事”，还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

（三）成熟阶段：隋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机构，并确立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失职，还可以弹劾皇子。唐代沿袭隋的监察制度，监察官分工明确，纠弹职责更加分明。值得一提的是，唐朝还设有谏官，负有特殊权力，如对皇帝进行劝谏、提议、对皇帝的诏书、命令及决策部门的政令予以驳斥等。

（四）强化阶段：宋代延续了唐朝的监察制度，对监察机关和监察官的职权进行了进一步扩大，设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监察官除了弹劾百官之外，还可直接侦办官吏。此外，因宋朝的御史职权扩大，兼负了谏官的职责，从而形成“台谏合一”。明初，一台三院体制被都察院取代，又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地方设监察御史。明代监察制度以及监察立法均依附于高度强化的君权之上。明代监察法律内容详实，细密，以《宪纲条例》最为完备。清代除了秉承明制，更是制定出了我古代监察法的一部代表之作——《钦定台规》。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监察制度也相应地趋于成熟完备。其突出表现：一是监察组织体制健全，分工明确。如御史台实行三院制，同时有言谏官，地方的监察系统趋于完备；二是监察权力广泛，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国家部门，唐代的御史大夫掌管国家的刑宪政令；三是法律法规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四是形成了监察官员的选拔和管理制度。如元代的台官自选制度，宋代在尚书省设立都司御史房，对监察官吏进行再监察。

**二、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在我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统治者内部的以官纠官，尽管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有其历史进步性。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进步性

1.监察机构垂直设置，相对独立

我国古代监察实质就是皇权的分支，是皇帝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家，监察百官，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设立的。因此，为保证监察工作的有效性，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魏晋之后，中央监察机构与行政机关相分离，成为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此后，从宋元时期的台谏合一，到明朝时的六科给事中，在编制与地位上完全独立，只对皇帝负责。监察机构的职权由分散到统一行使，防治了机构重叠，职权冲突，提高了监察效率。

2.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以小制大

历代统治者一般都给予了监察机构很高的地位但较低的级别。监察官员品级低，权限大，可以监察“自皇子以下百官”，可谓是位卑权重，以卑察尊。如西汉侍御史和刺史职级仅仅相当于县令，却可以监察地方长官；唐代的监察御史官职仅为正八品上，却有权监督六部尚书；宋代御史、谏官、封驳官都能监察百官的违法违纪行为；明代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干部，却可以弹劾宰相。历代统治者对于监察部门职级的设计方式极其微妙，正所谓 “官轻则爱惜身价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官吏之威重。”显然这种设置从当时的管理实践上来看，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3.监察官员选任与考核制度缜密，实行奖优罚劣

历代王朝尤为重视对御史的选任，因为监察官是治官之官。不同时代的官衔规定和表述虽然不相同，但均要求选用德才兼备，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而且还要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良好的政绩等。从两汉开始，对监察官员的选任、考核、奖惩都曾做出过具体且细化的规定。诸如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巡回监察官必须回避原籍和居住所在地；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实行监察官任职回避制度，以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实现等等。由此可见，历代对于监察官员的选拔要求均十分严格。

在对监察官员考核制度上，比一般官员更加严苛，奖优罚劣力度极大。如唐宋时期，御史、谏官等三品以上官员且由皇帝亲自考核，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标准，还设立了对监察官员专门的考核机构。明清时期，科道官要接受都察院与吏部的双重考核。奖优罚劣力度极大，不拘一格，拔擢重用考核优秀的监察官，如唐代从御史大夫提升至宰相就有多人。严厉惩戒失职监察官，且要承担与违法官员连带责任，从而保障了监察工作的正常运行。

4.注重“以法理官”的监察原则

我国古代制定了特色鲜明的监察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制监察权的行使。早在西周时期《吕刑》中就有了“五过之疵”的规定。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唐代的《监察六法》、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都是较为详密的监察法。尤其是以“钦定”命名，体现了监察法制的极大权威。使监察活动有法可依，监察官员不得任意妄为，保障了监察制度的平稳运行。这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尽管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治腐败，遏制贪污渎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和阶级矛盾，安抚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客观地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

1.监察机制处于皇权控制之下

我国古代监察权和行政权、司法权等权力一样，都隶属于皇帝，是皇权的一部分。皇帝设立监察机关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服务，监察机关的工作效果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本质还是“人治模式”。所以只有君主才是国家权力真正的监督人，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民权，而是维护皇权、限制官权。虽然监察机构是相对独立，但却无法独立于皇帝之外，实际上是封建皇权的附属品；国家权力机制处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对皇权有很强的依赖性，御史监察弹劾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皇帝。

2.“以卑制尊”的脆弱体制

为了使监察机构既发挥应有效能，又要防止监察机构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皇帝一方面赋予了监察官较大的权力，但同时又不得不压低他们的官职品级。这就使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缺陷，监察官员在弹劾高官贪腐时易遭打击报复，轻则被降职，重则丧命。这正体现了本身的脆弱性。监察官员权重的确能为整饬吏治提供保证，但也可能为滋生腐败的资本。虽然丰厚的奖赏能激发监察官员的反腐热情，但也会导致为贪图名利而滥用权力。

3.“官民对立”导致百姓监督缺失

纵观我国古代历史，没有找到发动百姓对官吏进行监察的史料记载。这是官僚政治的利益驱动与阶级属性使然，因为向公众开放监察权就意味着阶级利益的丧失，“官民对立”是那个时代的鲜明标志。封建皇权体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人民民主监督和公众舆论监督，他们只能依靠国家权力来监督国家权力，也就是自上而下以官监官。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它决定了古代统治者不能也不敢把官吏置于百姓的监督之下。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镜鉴**

当前，我国《监察法》颁布实施的时间尚短，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现代监察制度的目的和手段与古代相比存在根本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和监督方面是一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4]逐步完善我国新型监察制度，需要汲取古代监察制度中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

（一）确保监察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自上而下垂直的管理体制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国古代监察部分是皇权的分支，是皇帝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家，监察百官，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设立的。因此，多数朝代的监察机关都是自中央至地方垂直领导，相对独立，监察官员摆脱了行政、司法的权力桎梏，被誉为“天子的耳目”，直接由中央监察部门派驻。从而保障了监察活动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监察机制是一班人马两套牌子，党的纪委和政府的监察机关合署办公，职能分散到纪委、监察、检察院反贪反渎部门，在同一起案件中，监察力量无法集中统一，诸多机关分散办公，导致资源浪费以及交涉管辖不畅。采取上级监察机关和本级政府双重领导机制，造成监察机关受本级政府的领导和牵制，在对本级政府部门进行监察行动时必然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任重权轻”必然导致监督薄弱，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监察职责。

（二）完善监察法律体系，使监察制度规范化、法制化

监察活动不能任意妄为，为了防止权力过度扩张导致的失衡，我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者们均十分重视监察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详尽而严密地明确规定监察官员的监察范围，职责，以及官员奖惩。做到“以条问事”，有法可依。毋庸置疑，古代监察法规的颁布和施行，对监察工作发挥了其应有的正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监察队伍的清廉。

以古为鉴，参古酌今。反观当代中国，已经相继出台了一些监察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大力构建科学监察制度的决心，但仅有空泛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推出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具有实践操作性的、专项的更加细化的法律法规，而不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要使具体的监督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三）建立严格的监察官员选任、考核、奖惩等制度

我国古代历朝对监察官吏的选拔任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概括起来讲，对监察官的选任一是要有德，具体表现为清廉、刚正、勤政、稳重；二是博学多才，精通业务，谙熟法令；三是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突出的工作业绩。目前我国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来源鱼龙混杂，干部素质良莠不齐，难以迅速有效的应对手段花样不断翻新的腐败、违纪行为。因为监察官员自身素质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监察效力的实现程度。建议设立专门的、严格的选拔制度。亦可借鉴当下司法执业资格、会计师从业资格等行业准入标准，设立从业资格证考试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准入门槛。尽快培养出一批成熟的专家学者队伍，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测评标准，提高监察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选拔程序应当公开、透明，有社会公众实时监督，尽可能避免当地行政部门参与人事干涉。

我国古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监察官员考核奖惩体系，详细规定了对各级官员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惩戒则更加严厉。我国现有的监察官员考核方式虽是以民主测评为主，但最终还是由领导裁定，明显缺乏公平与公正。因此有推进监察程序法制化进程，细化规定监察官员选任、考核、奖惩等制度，建立新型考核、晋升、奖惩模式。

（四）强化社会监督，优化公众监督环境

我国各朝各代大多在监察体系内部实行反监互察机制，但古代监察制度缺乏群众基础，基本没有群众对于官员的监督。不过唐朝赋予御史“风闻奏事”的特权，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群众举报，只要不是造谣污蔑，监察机关就应当受理。虽然有助长捕风捉影的弊端，但它所起到的警示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强化社会监督尤其要抓紧建立群众监督的法律保障机制，使群众举报、申诉和控告等监督行为能够受到法律保护。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大约有80％案件线索来自于群众举报，说明群众监督的成效极大，但纪检监察机关监察工作的滞后性、被动性也暴露无遗。因此，要在法律相对完善的基础之上，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实现政务公开法制化，扩大群众在干部选任上的参与度；继续加强和完善信访举报的体系和网络，可以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专门的投诉委员会，鼓励广大群众充分利用网络、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监督举报，同时必须健全保护和保密制度；加强新闻立法，完善舆论监督的信息反馈和责任追究机制，并在第一时间及时公开处理结果。

总之，尊重历史，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是当下建设合理有效监察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讲政治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首要要求**

　 　 张云玲

实践充分证明，讲政治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腐败与公权力相伴而生，历史久远。有证据表明，政治腐败的程度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党的政治发展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腐败已跨越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性公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成为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在全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抓住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中坚力量的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讲政治就能消除政治腐败问题。

　　**一、领导干部用讲政治消除腐败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领导干部的腐化是通过权力为实现其私利而违背公认规范的行为。腐化总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在不同的社会中，腐化的程度有高低之分。一般的研究认为，政治腐败有以下特征：（1）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政府官员；（2）腐败是对公认规则的违反；（3）腐败行为的目的是损害相对人权益以获取私利。腐败是衡量政体是否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个主要尺度，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通过讲政治消除腐败提供了根本遵循。

1.把准政治方向。人们一般认为政治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一开始就是围绕国家权力展开的，表现为人们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新时代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把全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因为政治方向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政治方向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追求，要求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政治纪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由于政治方向是人们从事社会公共活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领导干部要把它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

2.坚持政治领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腐败更加严重，呈现出高级领导人腐化比率高等一些共同特色。从政治的角度看，其现代化一般采用外源式现代化——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自上而下强人推进模式；政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权力现象，是一种管理活动，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集权模式，军政首脑和执政党领袖拥有绝对权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严守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主要规定体现在党内一系列文件中，其中政治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首要的纪律，表现为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领导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盯住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使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4.加强政治历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会议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党内政治生活是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大熔炉”。领导干部要到学习中去，审思明辨，锤炼过硬政治品格。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肃认真地参加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不断锤炼党性，作为矢志前进的方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作为安身立命的标尺。

　　5.强化政治担当。政治担当是党员对党组织的一种责任，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尺度，是每一个共产党人要树立的首要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能否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是检验和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诚、是否对人民忠诚的重要标尺。领导干部必须担起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着眼长远、立足当下，秉承水滴石穿的坚定执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在政治历练和实践磨练中锤炼党性、升华人格、服务人民，在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彰显年轻干部的精气神。

　　综上所述，我们所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立在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基础上的政治，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政治，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廉洁从政的政治。新时代领导干部讲政治，核心要求是绝对忠诚，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提高政治站位，降低反腐败政治成本，让廉政建设效果持续稳定释放，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讲政治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讲政治问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全方位多层次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四个意识”明显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政治站位、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确保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风清气正。

　　1.以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政治理想和信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郑重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想从内容上来说，可以分为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这四个方面不是平列的，社会理想是其中的核心，是最根本的，规定和制约着其他理想；而信念是人们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学说和理想所抱的坚定不移的观念和真诚信服与坚决执行的态度。理想和信念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理想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信念是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意志和定力。理想崇高，才能坚定信念；信念坚定，才能坚守理想。所以党中央始终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教育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政治理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近年来，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各方面，体现在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的“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学习教育活动中，倡导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美德，广泛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以及当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推动各级领导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

2.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消除政治腐败。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中央果断查处一些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等问题，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消除重大政治隐患。大力加强纪律教育，强化政治巡视，执纪审查重点看是否组织、参加、支持反党讲座、论坛、报告会和座谈会等，检查对党是否忠诚，检查“四个意识”牢不牢、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坚决，落实意识形态责任是否到位，严肃查处公开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1.5万件，处分1.5万人，其中中管干部112人。通过严格落实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纯洁党的队伍，截至2017年11月底，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余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

3.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治吏。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必须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尤其是高级干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大力加强党章党规教育，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坚决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配置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不断强化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树立起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创新干部推荐考察方式，不搞漫无边际的“海推”，坚决反对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党内选举中搞拉票、助选等非组织活动广泛开展调研谈话，实行“凡提四必”制度，对政治上廉洁上有问题的干部“一票否决”，优化干部成长路径，好干部标准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党中央发布《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建立健全干部“带病提拔”问责机制，从源头上予以控制。强力排查可能存在的政治问题和政治隐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水平大大提升，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中加强政治历练、强化政治担当。

4.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党中央从作风建设入手，以颁布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严厉整治“四风”，查出对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新表现，让“四个意识”“四个自信”扎根社会、深入民心。坚决反对特权，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刹住了曾被认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克服的顽瘴痼疾，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使人民群众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党重固了初心使命、重塑了政治优势、重构了党风政风、重拾了世道人心，通过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持之以恒、抓常抓细抓长，让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讲政治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价值和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理论勇气、高超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领导干部为什么要讲政治、讲什么样的政治、怎样讲政治等重大问题，提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消极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有新表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的“两面人”还没有根除。新时代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通过领导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全面融入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不能动摇、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1.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夯实领导干部讲政治的思想基础。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学、持久学、及时跟进学，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课，分级分类抓好教育培训，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纠正政治偏差，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强战斗堡垒，教育领导干部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2．夯实政治根基，坚定领导干部的人民立场。从领域上来看，党政军民学，从方位上来看，东西南北中，最终结论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加强领导干部宗旨教育、作风教育、政德教育，使其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教育和激励领导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3.严明政治纪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高领导干部讲政治的底线意识。准确识别、及时清除“两面人”。加强政治纪律检查，严格监督检查党内政治生活状况、从政行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情况等，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是否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否政治观点鲜明、政治方向正确、政治立场坚定，着力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严格刚性执纪，对违反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的行为要一查到底，深入查找和纠治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错误表现，以及空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等突出问题，强化责任追究，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监督，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以严肃问责推动责任落实。

4.涵养政治生态，养正气、固根本。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多发，利益关系复杂。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好各方利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浚其源、涵其林，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从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基本制度抓起，有效解决不讲政治的突出问题，确保党的组织生活各项制度要求落到实处，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增强政治免疫力。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正风肃纪、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扎紧制度的篱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在身边、就在眼前，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将其渗入党组织的一切活动中，渗入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张云玲系西安外事学院思政部教研室主任、硕士、讲师）